

《西行漫记》两个重要中译本的翻译对比研究

张晓萌，吕淑珍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101；邹城市匡衡路小学，山东省济宁市，273500)

摘要：《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作为记录中国革命的经典报告文学，其汉译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深度交织，1938 年复社译本与 1979 年董乐山译本作为其重要译本，在翻译策略上显见差异。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差异根植于迥异的历史语境，1938 年“孤岛救亡”语境下的复社译本以“统战动员”为核心诉求，1979 年“思想解冻”语境下的董乐山译本以“还原历史真实”为目标，这种差异直接导致译本具体在书名处理、关键术语翻译、人物形象建构及叙事风格上呈现出系统性不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功能与经典化路径。对比两个译本为翻译社会学、红色经典译介史及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典型案例，有助于当下中国故事的精准译介与红色经典的现代传播。

关键词：《西行漫记》；翻译策略；时代背景；译本对比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世界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其中译本《西行漫记》自 1938 年面世以来，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内民众对红色政权的认知，其本身在中国的接受与演变，也构成了一段独特的跨文化传播史。这部作品的价值，超越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成为兼具历史文献与政治象征意义的重要文本。在诸多中译本中，1938 年由复社出版的版本与 1979 年董乐山翻译的版本具有对比研究价值。前者诞生于上海“孤岛”时期，是抗战救亡语境下的开创性译介；后者问世于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解放背景下对经典的权威重述。二者恰好对应了中国二十世纪两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译本的内部分析，缺乏将两个译本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系统对比的视角，未能充分揭示翻译策略与时代精神之间的深层互动。通过对两个经典译本的对比，深化对翻译活动与社会意识形态共生关系的认识，可为当下如何有效译介中国故事、活化红色经典提供历史经验。

一、时代背景从“孤岛救亡”到“思想解冻”

翻译活动始终是“时代的产物”，《西行漫记》两个中译本的翻译均深深烙印着各自时代的痕迹。从 1938 年到 1979 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时代背景的转变是构成两个译本差异的深层根源。

(一) 1938 年复社译本救亡话语下的译介

1938 年的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日军侵占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但这里依然是中国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胡愈之和一些坚守上海的爱国文化人士于 1938 年初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翻译机构——“复社”。胡愈之成立复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习明末复社爱国志士的行为，拯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胡愈之后来与陈原谈到“复社”这个名字的意义时也曾指出，复社的“复”有“光复”国土的“复”这一层意思^[1]。当时的政治生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1937 年 9 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民众参与抗战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范雪指出，“国内国际统一战线是斯诺的‘红色中国’故事的政策轴线”，《西行漫记》的翻译与出版，正是上海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

在这一使命中，作为“赞助人”的“复社”扮演了核心角色。它并非一个常态的商业出版机构，而是一群漂泊在“孤岛”、心怀救亡信念的知识分子(包括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

临时组成的出版团体^[3]。作为该译本的“赞助人”，复社的性质与使命直接决定了翻译的方向。当时身处上海的胡愈之在斯诺住处读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部书稿的价值，在党组织的支持下，胡愈之决定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由于租界当局已开始查禁该书的英文版，出版该书的中文版需要冒很大风险，即使翻译完成了，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为了该书能够顺利出版，胡愈之联合郑振铎等人发起创办了以“促进文化、复兴民族”为宗旨的复社。地点设在胡愈之家，为了避免敌人查封，复社的创办、运行、停业都是秘密进行，除了出版图书的版权页有该社名称和假地址“香港皇后大道”外，该社主持人、成员、地址等具体信息，外界一概不知。通过出版红色文献和进步文献，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民众参与救亡运动^[4]。

从意识形态诉求来看，复社译本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统战武器”，具有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诉求非常明确，对内旨在揭露真相、鼓舞民心、引导爱国青年向往延安；对外则希望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侨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在国内层面，当时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红军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谣言与误解盛行，《西行漫记》作为西方记者的实地记录，具有天然的可信度，翻译此书旨在向国内民众展示中共的抗日决心与红色根据地的真实面貌，鼓舞抗日士气；在国际层面，抗战初期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观望态度，中西方各界人士都十分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真相、红军苏维埃实况，正是在这个时候，斯诺不失时机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中共领袖的群像，揭开了中共及红军神秘的面纱。作为第一个访问“红都”的外国记者，这本书也是第一本冲破国民党封锁、传向世界的“红都”实录。翻译并传播此书旨在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争取国际支持^[5]。正如郭刚所言，从报告文学的“政治意义”来看，《西行漫记》是“诠释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这一历史必然性的绝佳样本”，而复社译本的核心任务就是将这种“政治意义”转化为救亡动员的力量^[6]。

（二）1979年董乐山译本求真话语下的重译

1979年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时期，“拨乱反正”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公众迫切渴望探求“文革”中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对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产生强烈的认知需求。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仅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更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开始有步骤地平反各类冤假错案。随着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西方文献的翻译也跳出了政治宣传的局限，更加注重学术性与真实性。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文化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冻”氛围。人们迫切希望冲破“文革”时期的思想禁锢，重新认识历史、了解外部世界。这种思想解冻的时代氛围，为董乐山译本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对《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记录中国革命起源的经典著作进行重译，恰好呼应了新时代社会公众“还原历史真实”的强烈求知欲^[7]。

该译本的“赞助人”三联书店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与文化权威性。与战时临时性的“复社”不同，三联书店在新时期承载着传播新知、启蒙思想的文化使命。三联书店的前身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长期致力于传播进步思想与学术著作，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7]。“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的核心使命之一是“还原历史真实”，通过出版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文学著作，推动思想解放与学术复苏^[7]。选择重译《西行漫记》，正是三联书店这一使命的体现——当时虽已有复社等早期译本，但这些译本受限于战争环境，存在翻译仓促、细节简略等问题，且历经数十年传播，部分版本已残缺，无法满足新时期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需求^[7]。出版董乐山译本，是其系统引进、重版中外人文经典系列的一部分，意在满足读者对高质量精神食粮的渴求，其权威性保证了译本能够广泛、顺利地传播。

从意识形态诉求来看，董乐山译本的核心是“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真实”。“文革”期间，中共党史被严重歪曲，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形象被神化或丑化，红色根据地的历史被片面解

读,董乐山译本旨在通过精准翻译斯诺的原著,还原中国共产党、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真实面貌,满足公众对革命史的理性求知欲^[8]。这种诉求与译者董乐山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被错划为“右派”,职业生涯一度中断,随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对“右派”问题的甄别改正,董乐山得以“第二次解放”,重归专业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职。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与国家的思想解放进程同步。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既具备扎实的翻译功底,又对历史真实有着深刻的敬畏之心,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准确性,更注重历史细节的还原与思想内涵的传递^[9]。董乐山并非被动地复制原文,而是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场“艺术上的再创作”,其译作充分展现了译者的创造性与个性。这种主体性的张扬,本身就体现了“思想解冻”后对个人专业精神的尊重。因此,1979年译本的意识形态诉求,从“救亡动员”转向了“求真与启蒙”。它旨在以更准确、更富文学感染力的中文,还原斯诺原著的纪实风采,满足读者对革命历史的本真认知,同时也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面向世界、反思历史、渴望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

总而言之,1938年译本与1979年译本,犹如两块时代的精神化石。前者是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精英以翻译为“武器”,在“孤岛”中进行的文化抗战,其生产与传播完全服务于抗战救亡的集体意志。后者则是历史转折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春光里,由重获专业尊严的译者进行的“经典重述”,其动力源于社会对历史真实与开放知识的集体渴求。这两种迥异的历史语境及其内在的“赞助人”体系与意识形态诉求,为两个译本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

二、翻译策略的对比分析

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发生“文化转向”以来,逐渐摆脱了纯粹的语言学范式,将翻译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在这一视角下,翻译不再是中立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深受意识形态、诗学规范和赞助人力量影响的“改写”(rewriting)行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指出所有翻译本质上都是对原文的改写,其过程与最终面貌必然受到特定社会中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以及赞助人(包括出版机构、政治力量等)三要素的操控^[10]。对《西行漫记》两个关键译本于书名、关键内容以及叙事风格的对比,系统剖析1938年复社版与1979年董乐山版在翻译策略上的本质差异,并揭示其背后的操控力量。

(一) 书名的翻译:《Red Star over China》的两种“改写”

《西行漫记》的英文原名是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为《红星照耀中国》,“红星”作为核心意象,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与红军^[11]。两个译本对书名的翻译选择,深刻反映了各自的意识形态诉求与时代语境。书名是作品的第一标志,其翻译策略直观反映了译者与赞助人对原作核心意象的认知与定位。

1938年复社版对于书名的翻译是文学化与策略性的。1938年译本选择以《西行漫记》为名,这是一次典型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考量下的“改写”。首先,考虑到原书名容易招致敌人寻衅,这一译名巧妙地避开了直译“红星”(Red Star)可能带来的强烈政治色彩,转而采用具有中国古典游记文学传统的“西行”与“漫记”相结合,使其在文学包装下显得含蓄而安全从而有利于发行^[12]。这与“孤岛”上海险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在日伪势力和租界当局的双重压力下,一个去政治化、文学化的书名更能保障作品的出版与流通^[6]。其次,“西行漫记”这一名称暗示了一种探险与见闻的叙事,增强书籍的可读性和传播性,更符合战时大众对“报告文学”的阅读期待,其目的是在国统区争取最广泛的读者,服务于抗战动员这一最高意识形态诉求。

1979年董乐山版对于书名的翻译是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回归与尊重。1979年董乐山译本则采用了“双书名”策略。该版本在封面主书名位置沿用《西行漫记》这一已具影响力的旧称,满足读者的历史记忆,同时明确在封面或扉页上标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

种并置策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尊重并利用了旧译本积累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恢复原著名，它明确表达了对斯诺原著标题及其象征意义（“红星”指代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回归与尊重。这一变化根植于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语境。思想解放的氛围使得“红星”所象征的革命意象不再具有敏感性，反而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符号^[8]。出版方三联书店在“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新译本是“为了保存原书的历史面貌”，这标志着翻译的意识形态诉求从“战时宣传工具”转向了对“历史真实”与“原著经典性”的追求。

（二）具体内容对比：从人物形象到关键术语

两个译本在具体行文中的差异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红色中国”形象建构的不同需求。

1. 人物形象的建构方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形象塑造，是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差异的集中体现。复社译本出于“统战动员”的目的，倾向于塑造“革命领袖”“抗日救星”的形象，用词具有强烈的动员性；而董乐山译本则更注重还原毛泽东作为“历史个体”的真实面貌，语言更为平实、客观^[13]。

复社版注重塑造“抗日救星”与“革命领袖”。在描述毛泽东时，1938年译本倾向于使用更具动员性和崇高色彩的词汇。频繁使用“伟大”“英明”“杰出”等修饰词，强调其领导地位与革命贡献，郭刚指出，复社译本的这一策略“契合了抗战时期的动员需求，让读者在情感上认同中共的领导地位”^[6]。在描绘毛泽东的形象与气质时，可能强化其“英明”“坚定”“平易近人”等面向，旨在迅速在国统区读者心中树立起一位可信、可敬的抗日领袖与革命导师形象，服务于统一战线构建^[12]。

董乐山版侧重追求“历史真实”与“人物立体”。相比之下，1979年译本的语言更为平实、客观，更注重展现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与思想历程。译者董乐山作为“学者型译者”，其翻译追求“最大限度忠实原文”^[14]。他对毛泽东的描写更注重细节还原与叙事平衡，不仅展现其政治领袖的一面，也通过生活细节、谈话内容呈现其个人性格与思想深度，使形象更加丰满、历史化^[15]。这种处理方式契合了“文革”后思想解放的氛围，公众不再满足于对领袖的神化描述，而是渴望了解其真实的人生历程与思想发展^[8]。这种客观化的塑造策略，使得董乐山译本成为学术研究的标准版本^[7]。

2. 关键政治术语的翻译层面

（1）红军

对于“Communist”“Red Army”和“The Reds”的关键政治术语。“The Reds”出现次数最多。《西行漫记》的译者将“Communist”译作“共产党”，“Red Army”译作“红军”，“The Reds”译作“红党”。董乐山把前两者也分别译为“共产党”和“红军”，但第三个词“The Reds”，基本被通译为“红军”。复社版《西行漫记》的译者们严格区分了“Communist”（共产党）、“Red Army”（红军）和“The Reds”（红党），他们力求为英文表达找到一一对应的中文词，并特意使用“红党”这一称谓。董乐山版则通常将“The Reds”也翻译为“红军”，不再需要额外的政治辩护。这一差异凸显了译者对“党”与“军”之别的重视程度不同。复社译者认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必须明确区分政治组织（党）与武装力量（军）^[2]。

（2）红色根据地

对于红色根据地的称谓，复社译本多使用“解放区”“抗日根据地”^[6]，而董乐山译本则更多使用“红区”“苏区”（苏维埃区域）^[8]。“解放区”“抗日根据地”的称谓突出了“抗日”与“解放”的时代主题，符合复社译本的“统战动员”诉求——向读者传递中共是抗日的核心力量，红色根据地是抗日的坚强阵地^[6]；而“红区”“苏区”则是历史事实的客观表述，董乐山译本通过使用这些历史称谓，还原了1936年的历史语境，满足了新时期读者对历史细节的求真需求^[7]。例如，在描述陕北根据地时，复社译本写道：“这是中国人民抗日

的解放区，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地”^[6]，语言带有强烈的鼓动性^[6]；而董乐山译本则表述为：“这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区域，是红军长期经营的根据地”^[7]，语言更为客观、平实^[7]。

（3）红区与普通战士

复社版是集体化、英雄化的颂歌。在描写延安、长征及普通战士时，1938 年译本常采用群像式、概括性的笔法，强调集体的英勇、乐观与牺牲精神。叙述视角往往带有强烈的共鸣感，使用“我们”等包容性人称，旨在激发读者的认同与向往^[6]。董乐山版为个体化、细节化的纪实。1979 年译本则更注重场景与个体的细节刻画。对红区生活的描写更具体，对普通战士的刻画更注重其个性化的语言、表情和故事，从而呈现出生动、真实的个体生命图景。叙述语调更冷静，偏向于旁观记录，体现了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15]。

（三）叙事风格：鼓动性与客观性的分野

叙事风格的差异直接关系到文本的传播效果，两个译本的叙事风格呈现出“鼓动性”与“客观性”的鲜明分野，这与各自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

复社译本的叙事风格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与鼓动性。受“孤岛”时期“报告文学”翻译热潮的影响，1938 年译本的整体风格强调可读性、故事性与鼓动性。翻译过程本身就如同一场“战斗”，由十二位译者“六七天突击译出”，这种“合译”方式固然可能导致风格不一和细节误差，但其核心目标是追求传播的即时性与影响力的最大化^[6]。为了契合抗战救亡的动员需求，译本注重强化情节的戏剧性，语言富有感染力，善于运用排比、感叹等修辞手法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描述长征时，复社译本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咽树皮，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这种表述突出了长征的艰辛与红军的英雄气概，旨在振奋鼓舞读者。吕迅指出，复社译本“以生动的叙事点燃了‘孤岛’及全国的抗日热情，成为震撼世界的畅销书”，其鼓动性的叙事风格是实现这一传播效果的关键^[16]。

董乐山译本的叙事风格则注重客观性与翔实性，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7]。1979 年译本由董乐山一人独立完成，体现了译者高度的主体性与专业性。其语言风格追求准确、凝练、富有文学质感，更贴近斯诺原著的报告文学风格。译本严格遵循斯诺原著的叙事逻辑，注重历史细节的还原，语言冷静、克制，避免主观情感的直接表达^[8]。例如，在描述长征时，董乐山译本详细翻译了行程路线、作战次数、伤亡人数等历史细节，引用了红军战士的具体回忆，让读者通过事实本身感受长征的伟大^[7]。这种叙事风格契合了“文革”后公众对历史真实的渴求——读者希望通过客观的史料了解革命历史，而非接受现成的结论^[8]。冯结兰评价董乐山译本“保持了斯诺原著的报告文学特质，既真实又富有文学性，成为史诗般的经典”^[5]。

参考文献

- [1] 梁志芳. 翻译·文化·复兴——记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个特殊翻译机构“复社”[J]. 上海翻译, 2010, (01): 66-69.
- [2] 范雪. 翻译《西行漫记》: 时代氛围中的“红色中国”[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 (08): 81-99.
- [3] 胡国枢. 《西行漫记》的出版与“复社”[J]. 学术月刊, 1983, (07): 79-80+33.
- [4] 黄超. 复社的红色文献和史料价值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23, (03): 136-144.
- [5] 冯结兰. 《西行漫记》的叙事艺术[J]. 南方文坛, 2013, (02): 103-106.
- [6] 郭刚. 《西行漫记》与孤岛上海文学翻译的转型[J]. 新文学史料, 2018, (02): 84-90.
- [7] 阳鲲. 三联书店版、董乐山译《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9(02): 116-119.
- [8] 王军. 董乐山与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J]. 兰台世界, 2012, (34): 27-28.
- [9] 廖莉. 《西行漫记》译者董乐山的西方文学翻译成就[J]. 兰台世界, 2014, (16): 109-110.
- [10]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1] 李杨. “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论斯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J]. 天津社会科学, 2015, (05): 103-116.
- [12] 李克莉. 胡愈之译学思想述评[J]. 名作欣赏, 2014, (36): 130-132+135.
- [13] 孙华. 《西行漫记》的传播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及中美关系的影响[J]. 出版发行研究, 2009, (06): 72-75.
- [14] 王丽杰. 学者型译者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6(07): 35-41.
- [15] 罗倩妮. 《西行漫记》译者董乐山的翻译追求[J]. 兰台世界, 2015, (04): 12-13.
- [16] 吕迅.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与中美关系[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06): 153-16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Importa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Red Star over China

Zhang Xiaomeng, Lü Shuzhen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Kuangheng Road Primary School, Shandong, 273500)

Abstract: As a classic work of reportage document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d Star over China has a Chinese-translation history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Fushe translation of 1938 and Dong Leshan's translation of 1979, two major Chinese versions, exhibit notable divergences 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divergences are rooted in drastically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Produced under the "isolated-island national-salvation" context of 1938, the Fushe translation centered on the demand for "united-front mobilization". By contrast, Dong Leshan's 1979 translation emerged amid the "ideological thaw" and aimed to "restor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These contextual-driven differences have brought about systematic discrepancies in the handling of book title, rendering of key terminologies,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narrative style, which further yielded distinct historical functions and canonization paths. Comparing the two translations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for translation sociology, the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history of red classic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t also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and the modern-day dissemination of red classics.

Keywords: Red Star over China; translation strategy; historical context; translation-version comparison